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

胡希宁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从学理逻辑上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既包括对它从纵向角度的分析,也包括从横向角度的分析。从纵向角度分析,它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承,又有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吸收。从横向角度分析,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既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科学判断和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供给;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2-0069-0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后,在学界及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大量广泛深入的研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并取得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成果。在此,笔者想从学理逻辑方面谈谈自己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对一种经济理论的学理逻辑既可以从纵向方面分析,也可以从横向方面分析。所谓纵向学理分析就是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完整了解某种经济理论的理论渊源和传承关系;横向学理分析就是对这种经济理论的内涵及其在自身理论体系框架中的定位、意义等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向学理逻辑:理论渊源

从纵向学理角度看,经济学产生初期并没有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区分,因为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还仅仅局限于探索财富的创造和产生的源泉究竟应当是在流通过程中还是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严格讲,包括重农学派在内,这个阶段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了财富的生产和创造的问题,涉及到了对供给的研究,但这时对供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是非常粗浅和单方面的,尚未将这种研究与需求方面联系起来。从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开始,随着“萨伊定律”的提出,人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才明确地将经济划分为需求方和供给方,力图通过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来找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决定因素。

“萨伊定律”因由法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重要代表萨伊提出而得名,其内涵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会自行地创造出需求,市场会自动地实现供求均衡。按照这一理论逻辑,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是供给方面决定了需求方面,市场机制会在供给形成后自动地创造出市场需求,因而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需要国家干预。在这一“教条”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的确走过了一段光彩照人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世纪下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出现。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内在弊端或局限性,以过剩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地爆发,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那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的神话,迫使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和“萨伊

定律”的适用性,从学理上重新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外在干预机制,“凯恩斯革命”由此应运而生。

凯恩斯经济学又被人们称为“萧条经济学”。由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凯恩斯提出并采用了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故被人们称为经济学上的“革命”。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包括了凯恩斯本人以及坚持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的那些凯恩斯经济学的继承者们的理论体系)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如下几个方面基本命题基础上的:(1)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总需求 = 总供给。在开放经济(即四部门经济)条件下,该要求就表现为: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出口 = 消费 + 储蓄 + 政府税收 + 进口。(2)国民经济高涨还是萧条取决于总需求方面。(3)经济中出现以过剩为主要表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原因在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受到“三大心理规律”(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

之所以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是因为:凯恩斯在建立他的理论模型时,采用的是比较静态和比较短期的分析方法,而总供给在静态和短期条件下是难以改变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的总供给状况主要取决于如下几方面的因素:总体的技术水平、自然和经济资源的总体状况、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经济格局、收入分配格局等)的合理程度、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状况、制度的安排等这五大方面都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在此前提下,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时,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就只能是针对总需求而采取需求管理政策,而针对总供给所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则难以奏效。可见,需求管理政策往往只具有短期效应,而长期内还是需要供给管理来发挥作用的。有关方面的很多观点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因受到启发而做的发挥或理论延伸,凯恩斯当时并没有讲那样细。

凯恩斯根据他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总需求 - 总供给模型、IS - LM 模型、乘数原理、有效需求原理等理论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以拉动总需求、实施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由此也可看到,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的诸多局限性中,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局限性:一是他片面地强调了需求管理政策而忽视了供给管理政策;二是他片面地强调了总量分析,而忽视了结构分析。凯恩斯的分析方法使得他片面地认为充分就业状况下的总供给不变,因此得出了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结论。凯恩斯的这种分析思路从形式逻辑上来说并没有错,但从辩证逻辑上或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经济中的供给管理政策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西德等个别国家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奉为圭臬,并系统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宏观调控。在推行 20 余年时间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增长绩效,但也带来了两大主要问题: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二是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滥用导致了经济停滞,带来了经济停滞与高失业、高通胀并存的所谓“滞胀”问题。这既在实践上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造成了重大挑战,又在理论上宣告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一部分人把形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滥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凯恩斯主义早已过时了。由此,供给经济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一时风光无限。

供给经济学的英文原名为 Supply - Side Economics,又被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它在思想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70 年代中期逐渐在美国形成。由于 70 年代末开始执政的美国里根总统自称“皈依”供给经济学并推行以供给经济学作为其政策理论依据之一的“里根经济学”,因而使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供给经济学批判凯恩斯主义只从需求角度出发的分析思路,提出经济学分析应重新注重社会经济的供给,并从供给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与主张,进而表明了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态度。

对供给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拉弗、蒙代尔、费尔德斯坦、罗伯茨等人。作为诸多挑战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理论学派之一(当时对凯恩斯主义提出质疑的还有现代货币主义等其他一些学派),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非是两个——“萨伊定律”和“拉弗曲线”。根据前者,他们提出反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根据后者,他们提出实施减税的政策。

供给经济学的产生在经济思想史上的确有其积极意义,即它使人们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以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拉动总需求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的推崇和依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经济形势、解决经济问题的新思路以及政策主张,在当时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它毕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其总体上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的,归根到底,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组成部分的供给经济学,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是不能直接拿来照搬的,更不能作为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反倒应当注意,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属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含着大量消极因素,如果盲目照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在社会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没有生产的发展作为基础,分配、交换、消费都是无源之水。马克思关于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具有决定作用(后几者对于生产亦有反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入手,深刻指出社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在两大部类内部亦有相应的平衡关系,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必须实现均衡这一原理的一种阐明。

通过这种纵向的学理逻辑分析,可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与经济学说史中的供给经济学有某种理论渊源或传承关系,但又不能等同于供给经济学。这种认识与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更是通过与西方经济学不断的论争、批判和扬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既有某种传承的关系,但更多的却是批判地吸收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代表了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其主流和基本面是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某些理论、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中有不少具有合理性的内容,甚至有些研究成果凝聚了多学科的精华,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我们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候,仍然需要本着以我为主、去伪存真的态度,充分吸纳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和内容,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从而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

对于供给经济学我们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供给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供给经济学。因为,首先,供给经济学主张强调和注重供给,但这种主张是通过大规模减税的手段增加劳动力供给,从而减少失业率,实现扩大政府税基的目的。它的供给主张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无法与我党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相媲美,即使仅从经济学本身出发来说供给经济学也存在极大局限性。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的转型改善供给,从而达到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益的目的,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使总供给与总需求逐渐步入良性、均衡运行的状态,经济整体上更具有活力。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单纯强调经济均衡一方——供给的改革,而是要在继续拉动总需求的同时注重长期的、动态的经济均衡,政策也强调的是长期的政策效应,是短期与长期结合的均衡。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横向学理逻辑:理论框架和结构

从学理逻辑上来讲,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从其形成之始便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了某种特定的位置。一般来讲,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了本质和主体理论、经济运行制度-态势理论两大板块。第二层次应当包括:从属于本质理论的有生产目的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从属于经济运行制度-态势理论的经济架构理论(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和经济态势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主要涉及市场结构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微观经济管理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这里涉及到了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有关层级问题,对此笔者将有另文阐述,这里仅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横向学理逻辑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所谓从横向学理的角度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和结构中所占有的位置等有关方面问题予以一些探讨。

习近平同志于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的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基于我国国情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断把经验升华为经济理论体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为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尝试。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曾被小平同志盛赞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及其所主持起草并在几次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集中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从学理上讲,经过这3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已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尽管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按照前述关于经济学分类和层次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层次的理论应当包括如下两大板块:

(1)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为根本手段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它又包括了第二层次的至少如下四个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主体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宗旨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在2016年1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出在今后发展过程中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且要让它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这是由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条件决定的。我党在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每个五年规划的基本目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它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发,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理论是我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虽然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使我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义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到了十八大之后对这一问题逐渐清晰化了。可以说,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国已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其根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2]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思想核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了其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健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报酬机制,激发其他市场要素(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的积极性,增强对海外相应要素的吸引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理念既针对防止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而言,又反对搞绝对平均、同步富裕,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劳动致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使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2)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衡、协调运行、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过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基本包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的体制、运行和发展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结合了中国经济建设实际与时代的发展,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一脉相承,又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是相容的,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更好地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正是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层次的三方面理论包括: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架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经济态势与运行三个方面的理论内容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的理论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早在我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初期就开始萌芽,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形成,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完善。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理论已形成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体系。它集中体现在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在总结此前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论述所体现的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和新格局,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宏观上的把握,以为

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2014年5月,通过前期大量调研和分析,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精辟论断。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更为系统地说明和论证了“经济新常态”,并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趋势、特点,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样一个重要的思路。

为了解决近年来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其实,党中央多年前即已提出需要对经济结构做出调整。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中央对中国经济所面临问题认识和研究的深化,这一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经贯穿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并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在同年12月前后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几个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又逐渐强化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统一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战略部署,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在2016年1月于中央党校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及它与西方经济学中供给经济学的本质区别等各个方面做了更为全面而科学的阐释。这些都为我们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从学理上应当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第二层次中经济运行理论范畴的。因为它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现实状况表现为“新常态”而提出的一种解决经济困境的新思路。但这种新思路的提出既是对我党领导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总结,又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它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又将对我国今后较长时间内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主要涉及了30多年来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结构、宏观经济调控、微观经济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的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等等做了深入的阐释。虽然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这一方面与我们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还不长、还不成熟有关,另一方面也还是受到传统管理思路的惯性和路径依赖影响,但毕竟我们已取得了不少可喜成就,在某些理论层面做出了创新。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这方面主要涉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新常态”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包括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多年高速增长面临新问题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态势及其应对措施的系统论述。在经济发展观方面我们党也能够实事求是地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将我们的发展思路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向速度和效益并举,之后又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近期习近平同志又将科学发展的要求具体归结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些也都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首先,“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经济范畴。这对范畴的区分始于新古典经

济学的“萨伊定律”。需求侧是指凯恩斯经济学所说的总需求,它包括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个因素,它针对总需求所采取的改进政策被称为需求管理政策。政府可以通过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内改变这四个因素的状况,从而改变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非均衡状况。供给侧与凯恩斯经济学所说总供给有很大的重叠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它取决于前述的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当然也包括了资本)、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制度的安排等五个方面的因素,针对总供给所采取的政策即被称为供给管理政策。这五大因素的改进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总供给的改进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中长期的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近10年的较高速的发展后,已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而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控从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居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进行的。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政策的边际效率已逐渐呈现递减之势。为此,笔者曾于2003年9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在拉动需求的同时改善总供给》一文中提出过一些在继续拉动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总供给的想法。^[3]现在来看,其中的主要观点还是符合目前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的。此外,从学理上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新经济周期阶段进行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其次,习近平同志在今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目的、任务、重点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突出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完善,既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加注重政府作用的发挥,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目的是要解决“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种困境,重点目标是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施的方法是依靠改革推进结构的调整,其中会有“加”有“减”。“加”是指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使供给结构更能适应对需求的变化,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是要减无效和低端供给,减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减僵尸企业。应当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实施的手点是从生产端入手;实施的重点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必须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建立在“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基础上的,它与“五大发展理念”等新思想共同构成了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完整思路。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既是对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它必将为我们顺利实现“十三五”目标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 [1] 陈林.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EB/OL]. 人民论坛网. (2016-01-04)[2016-03-1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9/c_128611416.htm.
- [2] 胡鞍钢, 杨竺松. 习近平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J]. 人民论坛, 2016(1): 22.
- [3] 胡希宁. 在拉动需求的同时改善总供给[N]. 光明日报, 2003-09-16.

责任编辑:刘遗伦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党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发力点](#)
-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与国企责任担当](#)
-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 [4. 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报道\(一\)--简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 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7. 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论:内涵和逻辑体系](#)
- [9.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 [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探析](#)
- [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管理研究](#)
- [1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解析](#)
- [1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广东探索](#)
- [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及推进路径](#)
- [1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8. 激励相容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逻辑](#)
- [1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了](#)
- [2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和做法](#)
- [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 [2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 [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
- [3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 [3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 [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
- [3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 [3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38. 发力“供给侧”——聚焦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弈“供给侧”](#)
- [3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0. 科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
- [4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
- [4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 [44. 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7.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 [48. 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5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